

還是最基本的權利，而吃飯是維持生命的基本動作。還比如，作者提出相對於民主的程序，更要講究民主的實質，提出了「良政」的觀念（頁134）。這種觀點是有意義的。只

是作者矯枉過正，流露出了較多輕視民主程序的意思，令人不敢苟同。然而，這些並不妨礙此書本質上仍是新權威主義在當下的巧妙變種，對此筆者不得不再次加以強調。

改造與控制

● 張慧卿



魏斐德的《紅星照耀上海城》以上海的社會管理為研究對象，與他的《上海警察》、《上海歹土》合稱為「上海警察三部曲」，敘述了上海警察從1927到1952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

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著，梁禾譯：《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 (1942-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紅星照耀上海城——共產黨對市政警察的改造 (1942-1952)》(以下簡稱《紅星照耀上海城》，引用只註頁碼) 是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教授的遺著，其中譯

本由魏教授的遺孀梁禾女士親自操刀，201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以上海的社會管理為研究對象，與魏的《上海警察 (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英文原著為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上海歹土——戰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 (1937-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英文原著為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兩書合稱為「上海警察三部曲」，敘述了上海警察從1927到1952年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

《紅星照耀上海城》一書論及了1942年以後，特別是1945年以後，共產黨如何通過在國民政府警察內部進行活動，建立秘密支部，最後將國民黨領導的上海警察機構變成由共產黨領導的公安局。書中細緻地描述了1949年以後至1952年上海社會管理的歷史，包括共產黨對城市的接管、控制流氓與輕罪犯、改造妓女和舞女、戒除鴉片毒癮、鎮壓武裝犯罪、打擊外國媒體、救濟難民與遣送回鄉、鎮壓反革命、「三反」與「五反」運動等內容。作者

認為，在1949年後的五年內，新政府控制了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難民問題，並掃除了上海的不法現象，同時還加強了對該城市的控制，這是一個震驚世界的壯舉，是一次革命的勝利(頁204-205)。

作者總結了共產黨成功的六方面因素：(1)對於接管周密謹慎的準備，其中包括對上海社會每一個層面的滲透；(2)行政管理上的充分程度；(3)吸收經過再教育並能積極聽取公眾批評的現存執法人員；(4)維持公共秩序，並迅速摧毀國民黨殘存武裝力量及其潛伏人員；(5)在居民委員會基礎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個新的安全系統；(6)發動愛國群眾運動，對付反革命份子和間諜(頁205)。

顯然，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管上海時發生過許多非法沒收和逮捕、國民黨接收大員實為「劫收」大員的現象相比，共產黨接管城市的戰略部署更為謹慎、周密，因此解放軍進城時的表現基本消除了上海居民的戒備和惶恐。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宣布了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為中心的戰略計劃。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重要決議號召把抗戰的中心從農村轉向中國的主要大城市。同年8月10至12日期間，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向各地區的武裝發布了十多條命令，要他們奪取大中城市。中共華中局還下令：佔領一個城市以後，官兵必須被派去接管公共機構，居民必須得到通知以防受驚，社會秩序必須得到維持。但由於僅蘇聯一國認可中共具有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共產黨奪取大城市的計劃沒有得以施行(頁67)。

隨着與國民黨的內戰勝利就在眼前，毛澤東也加深了對如何統治中國城市的思考。1948年4月8日，毛起草了一份給洛陽前線幹部的電報，其要點包括：在清理國民黨統治的機構時必須十分謹慎；明確劃分官僚資本的界限，不要一律沒收國民黨人士經營的工商企業；禁止農民組織進城捉拿鬥爭地主；進城時不要輕易發出增加工資、減少勞動時間的口號；不要匆忙組織城市人民舉行要求民主改革和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在大城市裏必須有計劃地分配糧食和燃料；國民黨人員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必須予以清理和登記；嚴格禁止毀壞生產資料，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的；嚴禁浪費生活資料。這份電報後來成了幹部接管中國城市必須學習的兩份文檔之一(頁69-70)。

1948年秋天，黨中央意識到沒有足夠的幹部接管城市。於是毛澤東親自向第二軍和第三軍發了一封電報，命令司令員停止一切工作，用整個月的時間來學習如何在城市和新解放的地區開展工作，所有軍隊幹部都必須學習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頁71)。1949年2月，華東局社會部副部長揚帆帶領了一支六十多人的幹部隊伍去淮陰收集情報和準備去上海的「策反」工作。華東局社會部還在濟南開辦了一所華東警官學校，陳毅市長向警校生強調有紀律地進入上海的極端重要性，並強調不允許他們游擊隊「野」的一面出現(頁73)。5月25日，第三野戰軍的主力部隊沿着三排車道的貝當大道(今衡山路)進入法租界，而陳毅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外灘。他們中沒有一人看起來有搶劫、強姦、

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管上海時發生過許多非法沒收和逮捕、接收大員實為「劫收」大員的現象相比，共產黨接管城市的戰略部署更為謹慎、周密，因此解放軍進城時的表現基本消除了上海居民的戒備和惶恐。

只要涉及到動員，國民黨的做法就是召開緊急會議，向下頒布法令，監督執行；而共產黨的做法則是到基層去，從底層開始組織，呼籲群眾積極參加，讓他們在社會管理中起重要作用。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鍵區別。

掠奪食物的迹象，他們甚至不會從居民那裏接受一杯水——這一行為讓上海的市民尤其受感動。於是「上海迅速地、而非漸漸地，落入了共產黨的地盤」（頁98）。

5月25至26日，聚集在丹陽的「影子警察」坐火車到達上海，與警察部隊內的中共地下黨委員會成員會合。然後，「接管專員」分別抵達各分局站所及警察總局。他們一邊重申「八項注意」，一邊讓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執行人民政府的指令，等待上級對個人情況的處理（頁104）。1949至1950年間，共產黨對國民黨警察進行「教育重組」，並以「拆屋重建」的方式進行調查和重新分配，使每個警察都可以被訓練成一個為人民服務的警察（頁106）。共產黨幹部行動迅速地接管了城市的公安，與早期改革努力並進的警察管理結構的建立，是新政權成功的關鍵因素。

作為一個熟諳中國近代史的西方學者，魏斐德自然地將共產黨在1949年及其後取得的成功，與國民黨在1927年後的失敗進行對比。他認為儘管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有着相當的近似性，但只要涉及到動員，國民黨的做法就是召開緊急會議，向下頒布法令，監督執行；而共產黨的做法則是到基層去，從底層開始組織，呼籲群眾積極參加，讓他們在社會管理中起重要作用。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鍵區別（頁122-23）。

從城市管理的經驗上看，儘管機構建設可以追溯到國民政府和日本侵華時期，但是潘漢年把國民黨警察機構的特點（保甲、社會家長制式、強調公共秩序）轉化為共產

黨公安局的作用。潘漢年、揚帆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掃除罪犯、腐敗和社會的混亂現象，關鍵在於他們成功地結合了警察機構的自我控罪和向群眾組織開放二者（頁206）。從社會大背景看，國民政府時期上海警察在管轄上的許多困難，均來自於半殖民地所享有的源於鴉片戰爭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治外法權」，但二戰後的上海已不再是一個租界眾多的城市了，共產黨幹部所進入的，是一個完全處於中國人統治下的城市（頁205）。

此外，魏斐德雖着筆不多，似乎也無意提及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在管理中國方式上的兩次分歧，但這或許可以成為理解新中國歷史發展的拐點。

第一個分歧在於國民黨法律的存廢問題。1949年2月，王明聽取毛澤東的指令，起草〈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立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推翻了國民黨的所有法律，一概否認所有國民黨司法機構的合法性，認為它們是反革命的。周恩來批評王明的草案，認為它違反了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不符合列寧關於蘇維埃法律應該採納資產階級法律系統最先進方面的精神，以及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應當保持資本主義法律中某些信條的論述。但王明的極端主義立場還是佔了上風（頁141）。分歧的結果是在新的法律意向支配下，國家公訴人（檢察官）不用列舉任何違法行為。被捕人被告知要讓步而非為自己辯護，這使得上海許多律師實際上失了業，並使辯護程式變得無效。確實，「正確」思想在整個中國成為一種司法責任，這一事實轉而

又加固了國家和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法院不再對犯罪下定義、對證據做真偽判決，不再研究供詞是否在合法的基礎上可信(頁144)。

第二個分歧是毛澤東反對劉少奇自上而下使用警察進行居民事務管轄，其結果是大量居民團體組織的建立。1951年10月1日，毛敦促彭真採取更全面組織城市居民的措施。1953年6月8日，彭真向毛和中央遞交了一份建議在全國每個城市成立街道辦事處和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報告(頁199-200)。1954年12月，全國人大通過了執行彭真建議的有關法律。根據法律，居民委員會必須接受市政府的指導，管轄眾多住戶的居民委員會必須建立多達五個下屬委員會，分管文化、社會事務、教育和衛生、公共治安、調解和婦女等工作。這些分會必須由市政府相關部門領導；而居民委員會有責任動員所管轄居民響應政府的有關號召(頁200)。在1950年代，上海公安局在維持城市的治安方面尤其依靠居民委員會。通過居民委員會的有效工作，上海里弄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秩序得以維持。

當然，在這本學術性著作中，魏斐德還提出了一些具有爭議性質的觀點，這些觀點並非毫無道理，但有待進一步探討：

第一，1949年6月20日，國民黨外交部正式通知在廣州的外國使者：從福建閩江北至東北遼河的沿海港口都「應當暫時關閉」；從6月26日起「外國船隻嚴格禁止入內」。嚴格地說，這是關閉港口的措施，但大多數外國政府都視之為全面封鎖。國際輿論認為，實行封鎖的做法，使廣州國民政府不再視中國內戰為一場「剿匪運動」，而是已經把

共產黨當作具有國際地位的敵手，從而事實上認可了共產黨新政權的地位(頁148)。這場封鎖，為共產黨後來採取的一系列大規模鎮壓手段做了解釋(頁151)。

第二，建國後一系列政治運動和社會激蕩與文化大革命具有某種歷史延續性。魏斐德提到：建國後，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大規模鎮壓土匪特務運動，加上專門的報導，在上海加重了一種意識，即敵人無處不在，永恆的監視至關重要，你隔壁的鄰居完全有可能是個間諜。顯然，這種意識一直延續到了文化大革命，引起了許多類似那個恐怖時期的牽強指控(頁169)。而鎮壓反革命運動削弱了人們對共產黨的初忠，讓城市居民感受到了「鬥爭哲學」。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前國民黨民事和軍事結構，尤其是士兵和警察。這是共產黨當局「鞏固政權的轉捩點」(頁189)，也是上海警察正式地、合法地對待在上海的外國居民的轉捩點。

上海民眾在經歷一系列政治和社會的激烈動蕩後，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敵視擴展成對所有西方事物的恐懼和多疑。在對國民黨秘密特務和日本間諜等各種警惕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最終相信了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佔據了共產黨上層，以及「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候已經到來的聲明和指示，並因此而毅然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頁207)。

魏斐德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全部用在這本書稿上。他與上海史的淵源，似乎也可因完成這部著作而得到某種程度的釋然。2006年9月，魏教授去世，「一隻孤狼走進／無人失敗的黃昏」……

在對國民黨秘密特務和日本間諜等各種警惕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最終相信了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佔據了共產黨上層，以及「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時候已經到來的聲明和指示，並毅然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